

有你们在，中国文学的创造力一定能生生不息

——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欢迎仪式侧记

本报讯 3月的北京，万物勃发，春风拂面。21日正值中国传统节气——春分，春分寓意仲春的正中点，是一年春意最盛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春意萌动、美好渐浓的时节，中国作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36位作家朋友“回家”，开启了一场春意盎然的文学之旅。

让作家朋友拥有真收获、留下真感情

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一层大厅，明亮的光线从天井落下，红色中国结张挂在两旁，一派祥和喜庆的文化氛围。

“万木葱茏才会有参天大树，大树由幼苗生长，有名从无名走来。新征程上的中国文学要涌现更多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作品，必须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生态，必须激发潜藏在人民中间的创作活力。”

欢迎仪式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用温暖亲切的话语向参加这次活动的作家朋友表示诚挚的欢迎。“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代表着我国文学事业中最基础也最具成长性的文学力量，有你们在，中国文学的触角才能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条战线、每一个角落，中国文学的创造力才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向高峰迈进。”

真诚的问候与殷切的期望流淌在作家们心间，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身为中国作协的会员，大家倍感自豪；身后有这样一个温暖的“作家之家”，大家倍感欣慰。

“中国作协是我们作家真正意义上的原生家庭，如果你认可中国作家的身份，那么这就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家。所有的人都有家，而且总有一刻也要回家。”来自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草原的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去年凭借《荒原》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作为第一批“回家”的作家代表登台发言。

“如果说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世界性的奔波或旅行，那么中国作协就是我们疲惫的时候、劳累的时候，甚至是受伤的时候，需要回来休养的地方，是给我们动力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安全可靠的、令人依赖的，为作家做了很多事情，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帮助。这些年，中国

作协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一直在用一个巨大的手掌撑开一片空间，让中国作家得以舒展心灵，得以一次又一次的文学旅行。”索南才让动情的话语道出了广大作家的心声，也引起参加此次文学周作家们的深情共鸣。

一份铭刻深情厚谊的特殊礼物

“有请范雨素，今天是你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218天。热烈祝贺！以资纪念。”

“有请章元，今天是你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6081天。热烈祝贺！以资纪念。”

……

欢迎仪式上，36位作家收到了镌刻着自己入会日期的纪念牌。这是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

为了给“回家”的作家朋友留下珍贵而美好的回忆，中国作协特意为每位作家定制了专属的“入会纪念牌”，牌子上镌刻着截至3月21日他们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天数。

听到名字后，作家们依次上台，领取“入会纪念牌”。大家难掩激动的心情，轻轻抚摸、细细查看手中的纪念牌。牌子上的数字像脐带一样连接着作家与“家”，铭刻着作家与“家”之间的深情厚谊。

每位作家都牢记着加入中国作协的日子，这一天是他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正是从这天起，他们有了新的家——文学之家。而领到个人专属的“入会纪念牌”，更将成为他们一生永恒难忘的文学记忆。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值得铭记的珍贵时刻。

“回家”之旅将成为人生中珍贵的记忆

随后，大家移步中国现代文学馆庭院，向文学馆园内的作家塑像致敬。

3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杨柳吐绿，玉兰芬芳，桃李争妍。园内散落着13尊中国现代作家雕塑：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冰心、叶圣陶、朱自清、沈从文、栩栩如生的塑像让人感到文学馆浓郁的文学氛围。作家们怀着肃穆的心情依次走到雕塑前，向他们崇敬的文学前辈献上鲜花，

（上接第1版《春天的旋律 生活的密码》）

王蒙对生活的这种炙热的爱和通透的体悟，同样感染了在场的作家们。陕西“90后”作家范墩子课后谈到“要对生活有热情、有兴趣，要学会从生活里挖掘创作的资源”对自己的启发，在课堂上，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作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该做哪些努力，才能让一个小说家找到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王蒙在回答中谈到自己对于诗的爱，强调了诗意对于小说语言的重要性。

课堂上，王蒙的妙语连珠常常使得大家欢

（上接第1版《文学创作是一场充满乐趣的冒险》）

6岁时母亲去世，文学的故事温暖着幼小的她，童年时她就知道要勇敢，要好好读书。血液里的文学气息伴随她长大，上学时大家在操场打篮球、踢毽子，李姗姗就坐在角落里，抱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

爷爷一度认为她生病了，只知道看书，也不和同学玩耍。有次爷爷带她去算命，李姗姗偷偷和算命先生说，一定要对我爷爷说，将来我能当作家。算命先生给了她一个信封，让她回家再打开。

时过经年，李姗姗在创作瓶颈期曾给中国作协的领导写过一封信，没想到竟然接到领导的电话，鼓励她持续写作，不要放弃，这让她重新找到了方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她，坚定了要用文学播撒爱的种子的信念。她不会忘记那封信上所写的话：“顺其自然，命中注定。”

黄孝纪很高兴能够与众多作家共聚北京。学建筑类专业的他，从高中起就热爱文学，岁月三十载，在工厂当过工人，去广东闯荡过，做过报社记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说：“我始终有个作家梦”。

黄孝纪的故乡位于湘南山区偏僻一隅，数百年来，那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耕种于斯，生长于斯。他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剧烈碰撞交汇期的乡

表达由衷的敬意。此刻，中国文学的经典与新生力量在此交汇。

“今天早上，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了欢迎仪式，见到了少年时期的文学偶像，收到了珍贵的‘入会纪念牌’，在文学馆园内参观瞻仰了现代文学大师们的塑像并献花，一会儿还将聆听‘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的‘春天一堂课’。这次文学‘回家’之旅将是我人生中珍贵的记忆，沐浴文学光辉，温馨、鼓舞、奋进。”布依族作家吴英文表示。

吴英文对能参加第1期“作家活动周”倍感荣幸。他谈到，中国作协的活动安排贴心、温馨、周到，让他有了真切的回家之感。在中国作协的关心培养下，他将继续努力创作，不断成长，贴近生活，抒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学作品，更好地实现文学理想。

“家是无以亲切的场景，而家人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去年刚加入中国作协的张二棍，对中国作协精心组织的这次“回家”活动表达了感恩之情。他说：“我们相信家与家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在尘世上的奔波和写作，才会拥有荣誉和道德感……‘回家’对于作家不仅仅是一场盛大的仪式，更是一次洗礼。期待‘回家’之后的再出发！”

“90后”作家肖干超曾经是一名演员，后转行当作家，他的诗集《逆光之旅》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他在欢迎仪式上领到自己的“入会纪念牌”，既惊讶又兴奋。他表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更应该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创作出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学篇章。

“作家朋友，欢迎回家”，这是中国作协对广大作家发出的温情呼唤，邀请作家朋友们回到作协，认同、发见人、聊趣事，感受中国作协助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潜心创作、成长成才的态度和心愿。正如张宏森所言，中国作协的大门永远向广大会员朋友们、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敞开！

（刘鹏波）

笑不断。江苏作家汤成难表示，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这么近距离听王蒙的讲座，尤其是他对于中西文学的信手拈来，譬如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被写作者所津津乐道的开头与李商隐的诗进行对比与分析，使她受益良多。辽宁作家刘政波（鬼鬼）表示，王蒙的表达和讲述令他钦佩，他找到了接下来在写作上应该学习和补充的方面。

直到在鲁迅文学院楼前集体合影的时候，大家依然在热情讨论课上的所得。春天的这堂课，不仅定格在照片中，也烙印在了大家的心里。

（许婉霓）

土中国巨变，也见证了岁月的流转、人世的更替和文明的传承。

近年来，黄孝纪以出生地湘南山区八公村为样本，书写中国南方乡村社会变迁。“中国乡村丛书”系列作品着眼乡村旧器物、饮食、农事、节庆等，旨在为一个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忆，为中国南方乡村立传。“作家周活动是很好的契机，希望自己借此机会提升文学修养，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加入中国作协的6081天，章元回忆起自己的文学之路，好像控制大脑的“CPU”烧了，有太多的感悟与经历。身为天津人的她幽默风趣，本来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脱口秀，因为紧张、兴奋等各种汹涌的情绪，最后变成了抒情式的回路与展望。20多年里，她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2014年开始涉足戏剧影视创作，至今已创作话剧5部。她将文学形容为自己“生命的荣光”：“驾着云踏着浪抚着琴，它就这样穿越千山万水朝我走来，那就走走吧，一辈子就和文学走下去吧。”

春雨渐似来，中国现代文学馆里却热情洋溢。作家们相互倾听着彼此，分享对文学与人生的体悟。就像邱华栋所言，感谢文学让大家相聚，融汇心灵，真诚交流。文学创作是一场充满乐趣的冒险，祝愿作家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继续创作出无愧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周莱）

这照耀过前人的光，也一定照耀着来者

「作家活动周」基层作家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当代中国文学最好的、最能引起共情的题材和方向。希望自己能够贡献微薄的力量，通过文学创作，为宣扬中华文化奉献一点微光。

现代作家书房展厅通过还原作家书房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复刻了作家写作的时空场域，展示了作家捐赠的藏书和文物。张志民女儿的花裙子缝制的台灯灯罩、臧克家雕刻着云龙五现花纹的花梨木写字台、萧军的“蜗蜗居”、冰心的“玫瑰花房”、丁玲的简易衣橱……参观展览的作家们走过一位位现代作家的书房，从丰富的器物中，想象和探寻着前辈作家的创作日常和生活细节。

“今天，我们走进文学馆，也是走进中国文学史，全面真实地了解了文学前辈们的生平、成绩和趣闻，内心很激动。”“60后”作家赵文辉谈到，作为一个从豫北小县走出来的写作者，他此前一直在县城开饭店，第一次走进这么宏伟的文学殿堂，感触很深，“眼界一下子开阔了，感觉自己离文学又近了一步”。

“我的文学梦想是记录当下餐饮人的生活，我想认真地写写他们。我们的厨师、洗碗工、大堂经理、杀鱼手，还有拉泔水的人，写写普通人的卑微和不易，生活的失败和挣扎，还有他们心底深藏的阳光。”赵文辉在参观过程中感受到，诚实地描绘生活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他会沿着前辈的足迹，乐此不疲地把饭店开下去，把小说写下去，把普通人的生活写进文学中去。

“80后”公安作家藤萍在参观文学馆的过程中，详细观赏了各位作家当年写作的手稿。她认为，通过手稿可以看见作家本人的性格，与网站和书本上的介绍相比，作家形象也变得更有亲和力。“有些人的字写得很清楚，有些人的字就比较潦草，有些人的手稿从头到尾一字不改，有些人则反复描红、修订多次。”她真切地感受到，不同时期的人，其思想一定与他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代风潮会催生不同的文学作品。她认为，此次参观能够让大家近距离触摸中国现当代作家前辈的本真状态，让他们从文学史中距离遥远的符号变成活生生的人，为当下作家的创作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

（教鹤然）



作家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

以革命立场研究「革命人」

从《黄金和诗意图》——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谈起

李超宇

当我开始准备为李国华的新著《黄金和诗意图——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撰写书评时，我发现李国华早已在《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谈起》一文中把自己对赵树理、茅盾等“革命队伍中人”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读者在研读《黄金和诗意图》时遇到的问题，往往可以在这篇《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里找到答案。比如李国华在《黄金和诗意图》中常有这样的谨慎表达：“本书仅提出一种谨慎的怀疑，即商业因素可能制约着茅盾长篇小说最初的生成，使之与旧小说发生微妙的联系。”“本书亦暂时仅限于提出问题，谨慎地怀疑茅盾最初生长成长篇小说时，能够完全壁立千仞，与‘旧小说’、现代旧派小说不生干系。”如此谨慎的表达与李国华在其他论域的斩截利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实际上，这两句话是作者在本书出版时新加的。添加的原因可以在《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中找到：“当材料和证据不足，结论未可遽下时，一定要耐心地斟酌表达的分寸，不能斩截利落之时，切忌斩截利落；围绕着郭沫若的隔膜和误会很多，也要有耐心等待，等待结实有效的反拨，等待历史淘洗出真相。”这份谨慎的背后是李国华对于研究对象的尊重和求真相的执着。

把这份尊重和执着落到实处的方法，就是李国华坚持的“尽最大努力去贴着对象讲”。对于“革命队伍中人”而言，检验研究者是否“贴着”对象的标准，就是能否尊重对象对于“革命”的选择。李国华能够充分尊重“革命队伍中人”对于“革命”的选择，用“革命人”的思路去研究“革命人”，这才是真正地“贴着”对象。鲁迅曾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革命人”写出的一定是“革命文学”，这是李国华研究赵树理、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共同前提：“对于茅盾而言，其一生与革命相关的行迹，无疑也是理解其小说的参照，而且更应当凭借极为细腻的文学形式理解，将之从其作品中读出来。”（《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

从“革命文学”中读出“革命人”的“革命”，这是李国华近年研究的主攻方向。这项工作看似轻而易举，甚至可能被一些旁观者视为循环论证，但实施起来殊非易事。且不谈柔石等作家的含蓄隐晦，就以本书重点探讨的《子夜》为例，茅盾笔下那幼稚而混乱的工人运动，很容易让人觉得工人阶级也将“被封闭在‘子夜’中，难见‘黎明’”。可见，从这样的作品中读出“革命”并不容易，它需要研究者抽丝剥茧地分析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群，进而首先排除掉地主、资本家、买办势力及其寄生虫的出路。在这一方面，李国华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在解释吴组湘关于《子夜》“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的论断时，李国华的论证还是略显单薄：“因为其运动在尚不成熟的组织方式中已经迫使吴荪甫倾家荡产，众叛亲离。”如果回到《子夜》中来看，迫使吴荪甫倾家荡产、众叛亲离的主力军其实并非工人，而是赵伯韬及其背后的各种势力。所以与其这样为工人运动作解释，不如像瞿秋白一样直面工人运动的失败：“吴荪甫以及周仲伟的失败是环境的逼迫，五卅示威以及闸北罢工的失败也是环境的逼迫，但在同一环境逼迫中却显示分野，那就是前者是历史上的必然，后者是战术上的必然，不能同一看法的！”（施蒂而《读〈子夜〉》）在瞿秋白看来，“立三路线”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很短的一个时期，所以工人运动的失败只是“战术”上的而非“战略”上的，因此并不能把工人与注定被“历史”淘汰的吴荪甫、周仲伟归为一群。而茅盾之所以要写工人的失败，本意其实是为了“分析并批判那时的城市革命工作”（具体见《茅盾选集》自序），并借此来教育群众。

以小说来教育群众、启发群众、动员群众，体现了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不但没有贬义，反而是“革命队伍中人”最希望实现的目标。茅盾后来承认：“作家下笔之前，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即使符合于客观的真实，也不能一定保证写出来的东西同他原来的企图丝丝入扣；主观上要批判的事物和人物，在作品中却给读者以相反的印象，这也是常有的事。”在《子夜》的接受中，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了，根据瞿秋白的观察，当时读到《子夜》的一些人，对吴荪甫表示同情，而对那些破坏吴荪甫企业的人（这其中也包括罢工的工人）表示憎恨……但是，作者在书中尽量描写工人痛苦和罢工的勇敢等，也许作者的意识不是那样，但在一些读者印象里却不同了。现在看来，《子夜》中吴荪甫的“主人翁光环”在事实上也导致不少读者对革命者发生了误解。

所以，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一方面要“从其作品中读出革命”，另一方面还要把作品放回革命中，公正地评价“革命队伍中人”对于“革命”的贡献和影响。两方面的工作同样重要，同样艰难，所以同样需要李国华式的谨慎。对于革命者和革命集体的关系，何其芳有关于“小齿轮”与“大机械”的经典比喻：“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对于茅盾、丁玲这类日渐坚定的“革命人”而言，他们必然会站在“革命”的立场，而不是“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他们必然会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尽力减少那些可能对革命不利的部分，而增加对革命有利的部分。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茅盾为什么在自己的寿辰上检讨：“我所懊恼而亦感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回顾》）

为什么茅盾在1950—1960年代没有续写自己未完成的旧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理论批评上？茅盾在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之后，一切公开的言行都应当考虑到革命功利的因素。写作仅仅是“革命队伍中人”的一项工作，在革命需要他完成其他更重要的任务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写作。因此，研究者要想“贴着”研究对象讲，就不能仅仅是尊重对象对“革命”的选择，还要像对象一样能时时站在“革命”和集体的立场，而非个人的立场来分析问题。李国华对“革命队伍中人”给予了“既切己而又有所超越”的评价，我想这里的“有所超越”指的就是在“革命”立场下的“忘我”或是“无我”吧——“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